

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论”辨析

孙 波

【提要】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称为“宋代近世说”),作为宋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范式,影响深远。宫崎市定光大其师内藤湖南的理论,沿袭欧洲历史的分期方法,将东洋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现代(近世)三期,并认为宋代应为“近世”的开端。对此,宫崎市定所持的两个主要论证核心是“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和“民族主义运动”。然而,中国古代王朝将“天下”视作自身的统御范围,这与近现代“国家”的领土不同,其根本政治理念“大一统”的涵义并不局限于“领土”方面的统一,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近现代国家“领土”的扩张,证明古代王朝具备“先进性”和“领导性”。宫崎市定还将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和近现代的民族主义直接对比,过分夸大了宋代“夷夏”之间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中的强弱看作彼此征伐、吞并的正当理由,从而暴露出其为日本侵华建构合法性的目的。

【关键词】 宫崎市定 唐宋变革论 大一统 民族主义叙事

一、问题的提出

“唐宋变革论”已是当今宋史研究中无法避开的理论范式。学界一般认为“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又由其弟子宫崎市定发扬光大。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讨论颇多,尤其对“唐宋变革”是否肇始于中国古代的问题颇为关注,如张邦炜、李华瑞等强调,我国学界早在南宋时期,便已经开始讨论相关话题。^①例如,郑樵认为“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②文天祥感叹“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浸废,予每为之浩叹”;^③明时陈邦瞻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④即便到了西学东渐的近代,亦有一众本土学者讨论此题,如梁启超仿内藤湖南借鉴西洋历史分期之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期。^⑤又如夏曾佑认为:“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⑥钱穆、雷海宗、侯外庐等人的著述虽然晚于内藤湖南,但或师承于夏曾佑等更早的中

① 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③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熊飞等校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④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91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3—174页。

⑥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国学者,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在思维范式的建立和推演上与内藤湖南迥异,因而可认为是独立成论。^①总而言之,力争本土学者是更早注意到相关变革的学术群体,是反思“唐宋变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讨论“唐宋之际存在大变革”的论断起于何时、何地、何学者外,受西方历史学思潮影响,持“唐宋变革论”者也常仿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利用长时段历史分期“制造”出各时段的差异。例如,在梁启超仿西人分期之后,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太古至秦为汉族缔造时代,秦至唐为汉族全盛时代,五代至明末为汉族渐衰时代,清以降为欧人东渐时代。^②又如,傅斯年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南朝陈亡之前为上世,其后至宋亡为中世,宋亡后至清帝退位为近世,民国建元后为现世;^③雷海宗则以文化史观的视角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战……第二周,由西元 383 年至今日”。^④

然而,上述“唐宋变革论”的两个重要讨论方向,大多聚焦于论题本身,在接纳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一头扎入了经济、政治、城市等次级话题研究的漩涡中,未能深刻剖析“唐宋变革论”在学理上的真正问题,尤其是其逻辑错误的根源。20 世纪后,学界中不同派别合流,上述两条线索逐渐合为一体,^⑤“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并引出了大量在此立论下对宋代历史各方面的细化研究。

在后现代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中,最显著的理论取向和特征就在对历史学文本的重视。^⑥本文认为,这里所说的“文本”指的不只是历史学的文献材料,更是注重历史学的“结构”应当以“文本”视之,这也意味着研究“文本化历史”的历史书写,非但没有将历史事实和历史书写对立起来,反而更理性地面对历史事实。徐冲提出了更为通俗、直白的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均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引,即必须在某种正当性的名义之下完成行动”,并进一步提出“广义的‘历史书写’,是人们为了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而做出的自我理解和形塑。^⑦换句话说,历史书写当然可以指向具体的文本化结构,但同时也需注意到非实物的、在历史记录者思维中驱使其完成文本化结构的功利性需求。孙正军提到的史料批判研究方法中“分析文献成书背景,探讨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文化思潮等对历史书写的影响”,^⑧也说明历史书写摆脱不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简而言之,对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也需要审视其历史书写的生成动机,以及支撑这种动机的具体逻辑。

事实上,我国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宫崎市定学术论述中隐藏的政治动机,如李华瑞援引傅佛果等人的研究,认为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拥护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政论需求高于历史学需求、日本利益高于中国利益、文化移动说背景下日本欲取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等一系列问题。李华瑞也尝试以政治、性别、多民族主义国家等多重视角来审视“唐宋变革论”,^⑨不过其并未深究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夷夏”观念和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叙事之间的差异,而这一点正是宫崎市定掩藏在

①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 4—7 页。

②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商务印书馆 1908 年版,第 9 页。

③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朱渊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8 页。

④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29 页。

⑤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 1 页。

⑥ 彭刚:《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概说》,《历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⑦ 徐冲:《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 年第 4 期。

⑧ 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 年第 1 期。

⑨ 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 年第 1 期。

“唐宋变革论”下历史书写方式的关键。

在《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宫崎市定以宏观的视角,给出了唐宋变革的论据。在“前言”中,宫崎市定摒弃以西洋史为世界史主体的旧法,抬高东洋的地位,并用“质—量”关系这一“公理”切入话题。宫崎市定认为“只有在结合量的情况下去讨论事物,才能比较不同的研究对象”,^①这显然是为了直接比较东洋与西洋历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历史学界将世界史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分期:“古代”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优势文明,“中世纪”以希腊、罗马居于统治地位,“现代”则是北方诸民族后来居上。宫崎市定将西洋历史分期的逻辑直接套用在东方,以三分法的“统一—分裂—再统一”的标准,认为宋朝应为“东洋之近世”。在“统一”与“分裂”的概念中,宫崎市定将“统一”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核心,并认为宋朝以后的“统一”与宋朝以前的“统一”大不一样。其观点“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和民族主义运动作为近世历史的两个特征”,^②也说明这一套论证逻辑的核心就是“统一”和“民族”。然而,“统一”并非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念的核心,宫崎市定眼中宋朝的“民族”,也非其所在时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之“民族”。换句话说,宫崎市定整套逻辑虽然看似严密,但都建立在两个有意或无意误解的核心概念之上,这一逻辑的出发点存在严重的问题。

二、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与宫崎市定“统一”叙事的区别

宫崎市定如果不是因为不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大一统”,至少也有刻意回避的嫌疑。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绝非宫崎市定提出的“大一统”能轻易代替,前者基本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秉持的政治理念,虽然“大一统”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有所差异,但核心要义没有本质变化。

在此,有必要简要讨论宋朝“大一统”的基本脉络,以厘清其与宫崎市定所论“统一”的区别。

“大一统”源自先秦时期,《春秋》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此的阐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③简单地说,“大一统”每个字都有其涵义,“大一统”之“大”,动词词性,意为“张大”“尊大”;“统”则代表着时序性的“统绪”;“一统”则对应先秦时“通三统”中的“三统”。在“通三统”的说法中,新政权建立之后,也需保留此前两个政权的后代及其相应的正朔、服色、礼乐,“三统”并存的目的是尊崇古圣王的德行。不过,“三统”之中,新政权的“一统”最为重要,“三统”并存只是为了延续前朝的合法性,^④而且随着政治现实中“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⑤汉儒又以“三统五运之说”进行改造,“三统”逐渐失去原有的政治涵义。汉武帝时,董仲舒延伸了“大一统”之义,认为无论正朔、历法等方面,都应当完全以新政权为尊,即社会各方面都要“统于一”。^⑥统治王朝实现了“大一统”,就会受到“尊大”,就能更好地加强唯一性的权力建构。

两宋之时,“大一统”一词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献中,主要是宋人强调宋属于“大一统”,如汪伯彦

①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学锋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②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8页。

③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页。

④ 晁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⑤ 《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5页。

⑥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5页。

曰：“应天顺人，大一统自今以始矣。”^①宗泽言：“孟子曰：‘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师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统之本根也。”^②刘颀认为：“从祖考以来，天下甫大一统，文教兴行，故两世俱以儒术，从进士贡。”^③此类论者，不一而足。袁燮详细说明了宋人眼中“大一统”的实质内容：“夫诸侯禀命于天子，所谓时月日、度量衡不容有毫厘之异，故当巡守之际，而协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心也，此即春秋大一统之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苟国自为政，则所谓尊者不胜其多矣。”^④由此可以看出，宋人谈“大一统”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实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政治统一。这种理念的覆盖范围是“天下”，而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疆域。

与此同时，宋人在讨论“正统”时，也会出现“大一统”一词。如张方平云：“太史公缀缉天下放失旧闻，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条贯信该，详而周悉矣。然而为史之法，系在本纪。纪者，统也。言王者大一统，正天下正朔。所禀法令所由出者也，而迁为纪始。”^⑤宋人的“正统”既要“得天下之正”，同时也仍然在强调“合天下于一”，由此也就强调其为“正统”。欧阳修对此下了明确定义：“《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⑥

不过，虽然宋人强调自己的“大一统”，但后世有时并不将其放入王朝“大一统”的序列中，究其原因还是宋朝并没有做到“一”。古代中原王朝长期面临着“夷狄”对于“中国”的地理割据和文化混同，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汉唐凭借和亲、战争等方式解决了“夷狄”倒悬的困境。由于向北战事不利，宋朝不得不面对现实，对辽、金选择平等甚至是以臣事之的低姿态，对内则极力强化绝对的“华夷之辨”，以避免在内部失去合法性、权威性，并打出恢复“旧疆”的旗号，来应对丧失故地的现实局势。^⑦北宋初年，当“群臣再奉表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时，赵匡胤回应：“‘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⑧到了南宋偏安江南，所声言光复“旧疆”的范围，已从北宋言及的“汉唐旧疆”缩减为北宋所辖之地。^⑨

至于宫崎市定论证中“统一”的所指，从其对于古代、中世纪、近世的时段划分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各时段的划分依据就是总体上看其是处在建立“统一”的过程中，还是处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过程中，如果某一朝代建立的“统一”地理范围比较大，那就可以归入“大统一”之中。同时，在讨论东洋的历史时，宫崎市定明确表示中国的战国时期只是“小统一”。那么，“大”的标准是什么？虽然宫崎市定也简单提到了文化等其他因素，但实质上就是根据其统辖的区域来判断其“统一”是否足以称为“大统一”，这也是宫崎市定认为罗马在整体上胜过希腊，并将前者的组织能力认定为减少了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2页。

② 宗泽：《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正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③ 刘攽：《彭城集》卷34《行状·为杨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0页。

④ 袁燮：《絮斋家塾书钞》，《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3页。

⑤ 张方平：《乐全集》卷17《论·史记五帝本纪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8页。

⑥ 欧阳修：《居士集》卷16《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1册，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7页。

⑦ 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二月己亥，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

⑨ 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各城邦、各民族之间内耗的原因,从而使得“社会表现出来的向心力压倒了形形色色的离心力”。^①

如果细究宫崎市定认知中的“统一”,还能看出其认为古代中国的“统一”也似乎随着长时段分期而被定义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过程。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全盛,这是一种“统一”,处于“东洋中世纪”的隋唐,即便实现了“表面上的大一统”,但内里的割据分裂倾向更为突出。而到了被定义为“东洋之近世”的宋朝,其经济力量的蓬勃“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牢固不破的基础,中世纪屡见不鲜的帝位篡夺现象也不再出现”。^②似乎宋朝以后的“统一”,是一种全新的“统一”方式。与此同时,宫崎市定将汉朝以后、宋朝以前的“中世纪”看作是对“古代时期”的纠正和自身的自觉,同时开启了近世以来的创造力。但是,只要梳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含义,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大一统”虽然不止于政治统一,但政治统一始终是“大一统”的核心。在某些割据时期中,“大一统”虽然相对不那么频繁地被提及,然而“大一统”仍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理念。宫崎市定所言颇具“割据分裂”倾向的唐朝,实际上不但谈到了“大一统”,甚至已经逐渐将“大一统”与“正统”联系起来,如皇甫湜《东晋元魏帝正闰论》中谈道:“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此说当为宋朝“正统论”开叶散枝的上源。^③

在宫崎市定看来,当“东洋之近世”被前推到宋朝,从而使东洋的“文艺复兴”早于欧洲文艺复兴,就为东洋的“先进性”和“领导力”赋予了足够的肯定。宫崎市定认为西洋在工业革命后的飞速前进,是短时期内的后来居上,且这种进步动力如果建立在东洋近世早于西洋文艺复兴三百年的基础上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西洋的腾跃是站在东洋的肩膀之上。相反,在西洋率先由“近世”进入工业革命后的经验与养分,则一定还会反哺于东洋。至于连接东洋与西洋的途径,则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关于交通的作用与意义,也自然回归到“分裂”之弊端与“统一”的利处,^④似乎只有“统一”才能保证不同区域之间的顺利交流。这种无视区域差异和独立性、几乎完全忽略其他区域“主权”,一味畅想政治、经济、市场等方面的“统一”观念,考虑到宫崎市定所处时代及其身份立场,其潜台词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物,去为这样的“统一”寻找一个具象的落脚点,即“统一”的对象,那就必须谈到“天下”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梁漱溟认为,古代中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有的只是“天下”的意识。^⑤中国古代统治者据“中国”而控“四夷”,天子的理想始终是统“天下”于“一”。用钱穆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当作一个文化肌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⑥梁启超作为将“民族国家”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乎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⑦成一农敏锐地指出,中国古代王朝的空间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的层

①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0—11页。

②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4—16页。

③ 皇甫湜:《东晋元魏帝正闰论》,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3页。

④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28、120、122、126页。

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⑥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页。

⑦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页。

次是超越于“国家”“部族”之上的至高存在,而不是仅在众多“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①因此,生活在宋朝的人们,实际上不会认为自己身处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之中。换句话说,如果宫崎市定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眼中,天下范围自当一统于本朝,由不得其他政权或个人妄加置喙;如果宫崎市定借由历史上的中国,讨论现代世界秩序下的中国,那么,他完全忽略了国际法体系的许多基本准则。因此,宫崎市定的“统一”叙事,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所异甚多,不足为凭。

三、中国古代“夷夏”观念与宫崎市定“民族主义叙事”的区别

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族”观念以“华夷之辨”为主线,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夷夏对立”“以夏变夷”“夷夏一家”“夷夏平等”及因俗而治等内容。早在先秦时期,时人便对华夏与其他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区别作出界定,如《尔雅·释诂》载,“夏,大也。”^②《尚书》释“华夏”一词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③此处即已透露华夏之别的信息。春秋战国时期更强化了这种区别,此时出现了华夏与“五方之民”的概念。据《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④这表明人们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地域、生活方式、语言风俗、生产方式等区分不同的族群,确立了“夷夏”相对的思想。

与此同时,也有试图缓和“夷夏”之间关系的声,如儒家便试图通过教化“夷狄”的方式吸引其归附,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⑤“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⑥时人还主张因俗而治,充分尊重他们的历史与风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⑦孟子则认为只要合乎礼节,即可称圣,以礼仪淡化“夷夏之别”,他将舜和周文王划入“东夷”“西夷”之列,其“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⑧荀子也曾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观点。^⑨

两汉时人多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都视为“大一统”王朝的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诸族同祖观”,北方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⑩南方楚国“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⑪越王勾践“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⑫将华夏与四周诸夷视作一体。到了隋唐时期,“华夷一家”的思想愈发成熟。隋炀帝曾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

① 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② 郭璞注:《尔雅》卷1《释诂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 《尚书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4页。

④ 朱彬:《礼记训纂》卷5《王制》,饶钦农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1—192页。

⑤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3《季氏》,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7页。

⑥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1《卫灵公上》,第1065页。

⑦ 朱彬:《礼记训纂》卷5《王制》,第191页。

⑧ 焦循:《孟子正义》卷16《孟子卷第八》,沈文焯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0页。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0《议兵篇第十五》,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9页。

⑩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⑪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89页。

⑫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

使遂性灵。”^①唐太宗也曾多次向群臣表示华夷之间当亲如骨肉,不分彼此,“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②“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讎敌。”^③

元世祖同样主张“天下一家”。^④当时的名儒许衡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⑤表明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儒家学者有意识地淡化“夷夏”之别,以合乎礼仪道统作为统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明清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一观念,明太祖朱元璋曾诏令:“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⑥提出“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的观念。^⑦雍正帝更是对“大一统”的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⑧

这些论述一方面总结了先秦以来“华夷之辨”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对清朝大一统王朝现实状况的描述。历史上王朝国家的“华夷”观念也体现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当中,包括唐、宋、明、清时期“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制度与土司制度。宋朝“因俗为治,夷民安之”,元朝也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维持原有的政治制度,如在吐蕃地区沿袭政教合一,在蒙古地区保持“千户制”,而在南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官制度。明清时期,继续实行土司制度,“一切政治,悉因其俗”。^⑨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有其独特的“民族”观念与理论,并贯彻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华”“夷”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立,且出身“华”“夷”的政权,都有着较为一致的“民族”观念。

论及宋时的“民族”观念,相关研究为数不少,如邓小南提出宋初上层官员将领有“民族混溶”的趋势,^⑩葛兆光认为宋代军事不利丢失故地后,原有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从实际执行的策略转变为安慰性质的想象等。^⑪当然,彼时的“民族”观念确实出现了转折,有宋一代不少士大夫面对政治上的危机,发出了苛刻程度远甚于前朝和后世的论断,也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其时出现了“族裔民族主义”的色彩。^⑫不同语境下的名词尽管涵义上有重叠和相似,然而一旦在讨论的时候脱离时代背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79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22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第6215—6216页。

④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5页。

⑤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18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04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月,第2125页。

⑧ 《大义觉迷录》,沈云龙:《近代近代史料丛刊》第36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页。

⑨ 《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页。

⑩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⑪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⑫ 江涓:《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景的差异性,造成的歧义也会消解由其成论的阐释力。

宫崎市定就认为自宋后“由于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大谈民族主义对立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的“民族团结”被一再破坏,即:“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到了宋代以后,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彼此之间因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对立。”^①这种说法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古代历朝突出的“一”强调的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性及其内部一家(姓)独大的传递性,且这种统治范围在名义上最好是无远弗届的,而非着意将“汉人”“华”和“夷”的根本利益对立起来,这就意味着王朝不可能成为某个特定民族的象征,因为所有地域都是其追求统驭的对象。换句话说,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无论是否是汉人,都不会在建立广阔统治时凸显其本民族的狭隘纯洁性。实际上,幅员广阔的、以汉人为统治者的隋唐和明朝并没有割裂“华夷”,同样统治范围巨大、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元、清王朝也始终在推行“华夷一家”的政策。只有宋朝在统治范围衰退的背景下,在对辽、金不得不让步的同时,仍在内部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地位。本质上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危机感作祟的自保宣传行为,与其美化成“民族自觉意识”,不如说是一种赵氏家族及其附庸面对一众强敌,无法复制前朝辉煌的无奈之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宋朝才是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华夷秩序中的“异类”,而非像宫崎市定强行构建的那样,认为宋朝是通过自身的“近世特点”上承下启了古代中国的民族大融合、大团结。

宫崎市定在强行构建宋朝承上启下的细节逻辑上也有硬伤。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后实现的“民族大团结”是“在整个东洋民族主义潮流的强烈驱动下实现的伟业”,“如果没有具有近世意义的民族主义潮流风靡东洋这样的时代背景,相信事情大概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②按照其逻辑,宋代以后的中央集权趋势既然导致了“贵族”的没落以及皇权的强化,同时“民族”间的对立又愈发自觉,那么,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环境下,多民族构成的政治体又如何产生更强的民族向心力?之所以存在如此悖论,一方面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天皇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是照搬西方的民族主义进程。然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本身民族与国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野,同时天皇的神圣性还兼具宗教的意味。至于欧洲历史中的政治理念,则和中国的“大一统”差异甚大。欧洲古代的民族划分,实际上针对的是基层民众,而非统治者。欧洲各国国王长期尊奉的“统”,实际上自罗马以后,几乎是一以贯之的。由于各国王室经常通婚,因此即便发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很少出现类似于中国“大一统”体系下“统”的更迭。^③反观古代中国,“统”会随着不同血缘、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权变动而变动。而费正清也认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古代没有太大的意义:“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④

与此同时,“大一统”并不强调基层民众的自觉权利,在意识形态上民众依附于统治阶级,因此归根结底,所谓古代中国不同民族政权之间争夺的焦点更多的是统治者对“统”的争夺,这是因为“大一统”意味着谁持有“统”,谁就能成为“天下之主”。宋与辽、金在边境的榷场长年互通有无,彼此贸易,生活习俗虽有差异,但即便在战时也并未势同水火。这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真正下沉到民族之

①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页。

②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8页。

③ 秦晖:《什么叫正常的民族主义》, [https://xw.qq.com/cmsid/20211103A010FD00? f=newdc\[2010-11-12\]](https://xw.qq.com/cmsid/20211103A010FD00? f=newdc[2010-11-12])

④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间的实际利益、文化冲突截然不同。

更令人深思的是,宫崎市定还认为:“民族主义当然是以既有的民族为基础的,但这不仅要统合既有的民族势力,更必须牺牲那些处于中间的少数势力,并将他们吸收。”^①那么,谁是那些可以被牺牲的少数势力,谁又应当承担起统合的责任呢?宫崎市定同样给出了答案,在其看来,即便被认为是“大一统”的隋唐王朝,其成就“并不是汉民族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侵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大团结的结果”。^②在宫崎市定看来,似乎民族主义的不自律性使得其无限的自我扩张倾向亦是无可厚非的。“在东洋的近世历史上,所谓大统一,不论是由占绝大多数的汉人来实现也好,还是由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古人、满洲人去完成也好,都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民族主义并非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也不是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因时因地,强弱有别。强与弱,较量的结果是由力学的法则决定的,从强中剔除弱者,这就是答案。”^③世界秩序的建立当然与国家的强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不代表国家的强弱就是左右世界秩序的唯一“法则”。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不同政权在逐鹿中原时,始终没有完全将自身的“强大”直接等同于法理,而是将文化、道义甚至是“天命”作为认定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像宫崎市定这般直接、甚至有些露骨的“力学法则”,绝非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和“夷夏”观念,更不能代表“近世之东洋”的进步所在,反而暴露出其为日本侵华编造所谓的历史合法性的本质。

因此,由现代民族观念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自然也就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不能混为一谈。无论根据当时的名家论述,还是从地理视角侧面剖析古代中国的政治逻辑,都说明现代民族主义中“我者”民族与“他者”民族之间的强烈对立,是不可能流行于古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可能存在对王朝的忠诚以及对“夷”的部分歧视,但这两种认知情感,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内核并不相同。宫崎市定希望通过混淆不同语境下的群体争斗,将民族主义强加到普通民众身上,从而得出民族主义早在宋朝就已出现的结论,无疑是立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唐宋变革论”的立意存在很大问题。至于城市革命、经济繁荣等次级论题,则是为了突出唐宋变革这一宏观理论而从细节处堆积的证据。从学理逻辑来看,如果以次级论题证明唐宋时期存在巨大的变革,虽然达不到“求真”的程度,且存在着逻辑上的薄弱,但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犹可为之;但若以“唐宋变革论”为预设立场,刻意寻找次级论题支撑此论,则谬甚于前者多矣。因此,从“大一统”“华夷之辨”等论题来看,虽然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起源因素的民族主义殊为不同,但由于自古以来民族意识的延续性对于政治层面合法性的巨大裨益,常被许多人在论及本民族历史的时候采用。只是这种采用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例如,因为宫崎市定不遗余力地拔高宋朝历史,在“唐宋变革论”的支持者的认知情境中,这是光荣且仍在延续的历史,对于其内心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民族主义情怀,都有相当大的满足。

结 语

通过挖掘“唐宋变革论”历史书写的背景和方式,可以看出日本学者采取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

①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3页。

②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5页。

③ 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9页。

不仅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的中国,对于当前的历史认知仍有余波。在其构建的民族主义历史语境中,通过“扩张统一”的建构、拔高更“优秀”的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历史主体的权利鼓吹,塑造了绵延至今的历史学话语权。但是,宫崎市定等人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内里是分裂的,他们一方面利用历史的时间属性、集体记忆来建构现有历史主体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宣扬现有历史主体在当下和未来的独特性和解构性。同时,这种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也在分裂其他历史主体的同时,暗自寻求增加自身的利益。这其中强烈的功利性通常被掩盖,误导了其针对的目标群体。具体到唐宋时期的历史研究,重点不在于争论宋朝是否发生了值得后人自夸的历史性重大变革,也不在于辩驳宋朝取得的各种成就应该由谁来执笔才算公允,而是透过“唐宋变革论”这个论题的外衣,深刻思考我们应当警惕并选取什么样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这并非将对历史事实的追寻与历史书写对立起来,而是必须注意到,不同的历史书写势必会影响追寻历史事实的结果,因此,也就有必要甄别不限于文本结构化的历史书写方式。

与此同时,不少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常常致力于摆脱传统的“中心—边缘”叙事,从史学理论的多元化视角来看,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研究主体视角的多元化,并不代表能够过分“制造”古代中国“夷夏”之间的二元对立,更不能借这些“对立”,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叙事杜撰成谁强谁就具有更多合法性的“征服者”叙事。在“征服者”叙事中,论证逻辑往往会出现“征服者”借助自身“先进性”带来的暴力优势,鼎革掉“被征服者”的“黑暗”或“衰落”。然而,如果将这种建构与国外学者批评的传统“中心—边缘”叙事两相比较,那么,除了双方主客体的位置互换之外,建构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论证中,关于“征服者”叙事所必需的“先进性”要素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赞颂宋代交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繁荣,更需要挖掘繁荣表象背后宫崎市定等人“强弱法则”的潜台词。换句话说,部分国外历史研究者通过拔高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方面,致使一些国人在自豪之余,忽略了其间的草蛇伏线,甚至于全盘接受“唐宋变革论”,沉溺于推论更多关于宋代发展的历史结论,最终的结果就可能变成:一旦不忍严苛地审视宋代繁荣的既有研究,就不得不搁置“唐宋变革论”立论者原本并不单纯的建构逻辑;相反,一旦想要强调中国历史研究学术话语权时,又面临着割舍“唐宋变革论”下宋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归根结底,若要摆脱这种两难的研究境地,就必须在吸收国外研究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符合中国历史情境的相关概念,而不是拘泥于将西方的史学理论范式套用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最终深陷于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中。

(作者孙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65009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emergence of the field is based on the abundant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duced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preserved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t also benefits from applying legal history to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Criminal history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legal system.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study of crimes through legal history adds a new angle and facilitates investigation into legislative control; Secondly, the study of criminal group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through social history broadens the scop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w, conducive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criminal history, we cannot just limit ourselves to microscopic and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of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to grasp the variability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society at the macro-level.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roache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and the Turn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 Wang Wenfei

In the 1990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wa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French history to criticize the bias of the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for antagonizing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and ignoring the diversity of colonial social backgrounds.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to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not just changes in form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but also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has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o change the general, vague, and non-active inherent image of the colonized, emphasizing the dynamic of colonial societies; secondly, to bridge the narrative gap between metropolis and colon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empires; thirdly, to transcend spatial limitations of the colonial empir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irculation of people, materials, and ideas among empire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is converged with the rise of new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in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jointly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Zhao Yueq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y but with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viewing history as the result of class struggle, it analyzes Egypt’s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a crucial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It is built upon the respons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o coloni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realit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not only continued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Marxist principles, but also expands the scope of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eyond China in foreign land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has experienced various stages from being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to evolving into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y, from sticking to dogmatism to pursu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from promoting class struggle to embracing anti-extremism.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n Miyazaki Ichisada’s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 Sun Bo

Miyazaki Ichisada further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Song Dynasty” (also known as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a hypothesis proposed by his teacher Natio Konan, one that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Miyazaki Ichisada followed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pproach originated in Europe,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ancient, the medieval, and the modern times, and he argued that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s. In this case, the two main core arguments held by Miyazaki Ichisada are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 However,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regarded all “under the heaven” as the ruling area on their own ter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erritory” in modern states. The principl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Great Unific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erritorial unification. Hence, the invasion of territory in modern times cannot prove the “progressive nature” and “leadership” of ancient dynasties. Moreover, the ancient Chinese perspective of “Yi” and “Xia” was in direct contrast to nationalism in modern times. Miyazaki Ichisada exaggerated antithesis between the “Yi” and “Xia”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deemed it as just cause for military conflicts, whose goal, as revealed, was to justify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Zhu Qianzhi’s Road to Marxism // Yin Feifei

Anarchist Zhu Qianzhi’s road to Marxism was a process of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 and peeling of the layers to discover the truth.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u criticized Marx’s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rom an anarchist perspective. Yet he emphasiz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adhered to the communism of great harmony, which was in tune with the basic ideas in Marxist revolut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studying in Japan, he analyz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of life,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dialectics became an academic linkage that connected him with Marxism. Through social and cultural pursuit of saving the n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developed a clear vi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rew mor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deological discours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wever, it is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iticism and research”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that served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Zhu Qianzhi to embrace Marxism ultimately.

Hu Qiaomu’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in the Age of Opening-up and Reform // Zhang Lianyo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u Qiaomu offered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significant issues in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He argued that, based on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writing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hould serv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weapon for ideological struggle. He argued that one should embrace scientific views and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scientifically interpreting various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He also called a return from the vivid and rich style in writing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Party History. He believed that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uld not offer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Party History. Only by clarifying its dominant themes, exhibiting its significant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within macro narratives, and re-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that were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could the writing of Party History return to its original course.